

# 1 绪 论

## 1.1 投资研究的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特别是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过去多年来一直是商品紧缺的格局逐步转变为商品过剩，出现了需求不足的局面。1998 年开始，国家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使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公务人员工资，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出口，至 2001 年底共增发国债 5100 亿元，大幅度增加了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驱动下，我国经济在国内需求不旺、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国家的高投入、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产生高通胀，相反，伴随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却是低通胀，甚至负通胀，其最主要的表现是物价指数近年来在我国呈负增长。1996—2001 年间，央行虽然已连续 8 次调低银行存贷款利率，但投资、消费需求增长并不理想，相反，城乡居民存款却有增无减，2000 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已达 7.4 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启动我国的内需，是我国的总投资规模不够还是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对启动内需和经济增长中作用究竟发挥的如何。对此我国很多学者都作过很多研究工作，研究的成

果也很多，但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消费和需求角度研究的较多，而对投资的研究较少；在投资的研究中基本是从需求角度定性研究的，定量研究较少；对投资规模的研究较多，而对投资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对经济增长的效用研究不够；对投资对需求的拉动作用研究的较多，而对投资对供给的促进作用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在投资政策的运用上往往只重视投资对当期需求的拉动作用，而不重视投资增加后期供给的作用，只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重视不够，对微观经济行为者的行为研究得不够，政府在投资配置中的比重过大，市场在投资配置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之所以能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对投资的研究和认识不够，特别是对投资供给功能的认识不到位，没有能正确的处理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投资的运用中往往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用了投资的副产品而放弃了投资应该发挥的作用，其结果致使我国微观投资决策失误较多，宏观经济波动较大，投资规模始终处在一个扩张、压缩、再扩张、再压缩的怪圈，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当宏观经济产生波动时心中无数，往往是从投资规模开刀，急刹车、猛启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挖了东墙补西墙，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和浪费。虽然目前我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真正依靠市场的力量自主增长的机制和动力还尚未完全形成，靠政府投资支持的经济增长根基并不牢，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针对这个问题，本文拟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投资的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进行量化实证研究，对启动内需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其目的是为了分析我国在投资运用中的弊端，为我国正确的运用投资、正确的处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理论支持，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服务，为宏观投资决策服务，从而不断地提高我国的投资配置效率，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启动内需和经济增长服

务。这不仅是当前经济学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笔者选题的主导思想。

## 1.2 国内外投资研究现状

经济增长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中已经作为中心问题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也应运而生。研究经济增长理论必然要研究投资，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增长理论就是投资理论，只有把投资研究清楚，才能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发挥投资在启动内需中的作用。如果对投资认识不清，投资配置不当，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

### 1.2.1 国外投资研究现状

对投资理论的研究最早要从亚当·斯密开始。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分析了投资对各类资本积累的影响及资本的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资本的积累，二是资本的有效配置。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决定因素是投资增长率<sup>[1]</sup>。在亚当·斯密之后，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为《通论》），凯恩斯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由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影响，有效需求经常不足，尤其是投资需求不足，因此政府必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使社会有效需求增加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他认为在需求

不足时，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失业必然存在。凯恩斯在《通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投资乘数理论，即在一定的消费倾向下（消费倾向大于零），国民经济中新增加的投资可导致收入的成倍增加。凯恩斯的投资理论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微观向宏观转移，标志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凯恩斯在《通论》一书中虽提出了一套减少失业的就业理论和政策措施，但凯恩斯的分析方法是短期的分析方法，并且这种分析是假设人口数量、资本数量和技术条件不变情况下的静态分析方法。事实上从长期看，事物总是变化的，是处在动态之中。为了克服凯恩斯理论上的缺陷，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和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F.Harrod）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之上都同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哈罗德于1939年发表了《论动态理论》一文，1948年又出版了《动态经济学导论》一书。多马也先后发表了《资本扩大、增长和就业》等研究文章，他们系统地长期和动态角度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对于有效需求不足，他们认为凯恩斯只注重了投资在增加总需求方面的作用，而忽视了投资在供给方面的作用，投资实际上有“两重性”，它既可以增加总需求，又能形成新的能力，增加总供给。从凯恩斯的总需求等于消费与投资之和，总供给等于消费与储蓄之和，显然可以看出凯恩斯只考虑了投资增加总需求的作用，而没有考虑投资增加总供给的作用。凯恩斯的乘数原理，即投资—扩大需求—刺激生产—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扩大需求—刺激生产……，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凯恩斯只注意了投资增加需求的一面。哈罗德—多马模型代表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总是与剧烈波动相伴而行，经济的长期增长难以持续。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罗（R.M.Solow）、英国经济学家斯旺（T.W.Swan）也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凯恩

斯以前传统的经济学成份，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后来，经济学家米德、萨缪尔森（P. Samuelson）等又进一步的系统研究，发展成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一些经济体系的外生变量如技术进步或人口增长作用的结果。在外生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下，经济能够实现持续稳定增长，而不会发生经济的大起大落和经济增长过程的停滞，社会也不会出现失业和通货膨胀。此结论是在以下假设条件下得出的：（1）萨伊定律，即供给可以创造需求。（2）储蓄永远等于投资。（3）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这些假设在哈罗德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不包括，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与哈罗德—多马假设的资本和劳动之间保持固定比例不同，它假定有数目不同的若干生产过程，在市场调节下，劳动和资本以可变的比例相结合，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着重研究在劳动和资本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些资源仍能得到充分利用时经济所遵循的增长途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同<sup>[2]</sup>。

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T.W. Kendrick）研究认为，产量和某一种特定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比率是部分生产率。产量和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比率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不会受要素投入量结构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能反映出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肯德里克认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无形投资、资源配置的合理化、技术扩散、生产规模的变动等，但他没有对这些因素的影响大小进一步的进行定量分析研究<sup>[2]</sup>。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 Denison）和西蒙·库兹尼茨（Simon Kuznets）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具体化、数量化，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创造性的分析，这不仅极大的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也给人们在经济实践中正确认识总体增长中各个因

素的不同作用，并以此为根据为调整经济增长的速度、预测经济增长趋势提供了方法和工具。丹尼森把这些因素分为七项，其中包括就业人数及其年龄-性别构成、工时数、就业人员的教育年限、资本存量的大小、低效率工作使用劳动力比重的减少、规模经济、知识进展。丹尼森认为，要素投入量与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西欧总增长率的 40% 是由要素投入量提供的，60% 由要素生产率提供，而美国正好相反。但丹尼森的这种方法在经济增长因素分类的细化，用知识进展来代替教育、科技、信息、人力资本开发诸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过于笼统；用剩余法估算知识进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等<sup>[3]</sup>。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 M·F·斯科特从投资的定义入手，分析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斯科特认为投资是经济系统化的成本支出，它涉及为了预期的结果而对目前消费的牺牲。斯科特的投资不仅包括物质资本投资，而且包括人力资本投资<sup>[1]</sup>。

新剑桥学派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 J·罗宾逊和卡尔多。新剑桥理论批评新古典理论对储蓄和投资的古典式研究，主张回到凯恩斯的研究方法上去。新剑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源泉，投资并非取决于储蓄倾向，而是取决于企业家的决策，而这些决策依赖于他们在不久前的经验、政府的政策、对承担风险的意愿的社会文化影响之类的因素。新剑桥学派增长模型的特点就是把收入分配作为实现充分就业、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哈罗德模型中，有保证的增长率是由资本-产出比和储蓄率两个因素决定的，因此解决增长路径的不稳定性问题可以通过调整这两个因素来实现。索洛模型中采用的办法是可变的资本-产出比，而新剑桥模型则是通过调整储蓄

率<sup>[1]</sup>。

与新古典学派不同，制度学派承认制度变迁的重要性，但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演进及制度的弊端上，而没有进一步的把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与之联系起来。20世纪60年代后，一批经济学者建立了溶入制度因素的新经济增长模型。1971年，佳林·库普曼和约翰·迈克尔·蒙泰斯提出了表述经济体制和经济业绩之间关系的函数式： $O = f(E, S, PS)$ ，其中O、E、S、PS分别表示业绩、环境、体制和政策，假定环境不变而将政策纳入体制之内，则可得出对经济业绩起主导作用的是体制因素的结论。1973年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拒绝承认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只是把上述因素看成是经济制度提供刺激后的结果<sup>[4]</sup>。1966年舒尔茨和诺斯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制度内生性增长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诺斯在《美国昔日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一文首次提出了新经济史，诺斯对新经济史的“新解”代表了新制度经济学增长理论的最高成就。诺斯认为：“有效的经济组织和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所有经济史上的增长都是产权体系不断向私有化演进的结果，所有停滞都是产权体系不向私有化演进的结果，这就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奥秘所在。”诺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指出，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所有市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无效率，通过比较可供选择的制度框架，我们分析发掘出那些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制度创新<sup>[5]</sup>。

波兰经济学家卡波莱斯（M.Kalecki）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最早的开拓者之一<sup>[6]</sup>，1963年他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大纲》、1969年他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导论》等著作，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增长率和投资率。他认

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三个因素，即投资的生产性效应使国民收入增加；设备损耗的负效应使国民收入减少；改善现有设备利用程度使国民收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限制主要来自于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劳动力供给和国际贸易这三个方面，因而加快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在于促进技术进步。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和斯考特也都把技术进步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斯考特的理论并不把技术进步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他认为技术进步同投资密不可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用投资的数量来测量。

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李斯特（Friedrich List）认为投资于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比投资于财富生产本身更为有效，投资于综合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财富的增加，这隐含了丹尼森全要素投资的古典形式<sup>[7]</sup>。李斯特不同意亚当·斯密“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及娱乐品”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生产力，则富可变穷，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在投资制度的选择方面，李斯特明确地指出，私人经济是以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为基础的，而国家经济则以整个民族和社会利益为基础。他反对英法古典学派关于个人利益追求自然可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观点，他指出个人的投资行为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很少有人为后几代或全社会利益着想。他认为“诸如保卫国家、维持公共治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数不清的任务，只能借助于整个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必须对个人的自由加以限制，牺牲他们的部分收入和劳动，由国家来统筹支配举办公益事业的投资。古典学派最为重要的发现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形成有效投资的最佳环境，竞争性的市场价格自动的引导资本投放于最能生利之途。这一基本

的见解来自于古典经济学派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和国家仅仅充任“警察”、“守夜人”的思想框架。德国的历史学派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经济人”的简单假设应将国家列在其中，有效投资不仅需要—个主导的投资框架，而且应集中—点投资于创造生产能力的行业。同时李斯特还强调各国的发展水平道路不同，不存在共同的发展规律。在他看来，自由贸易不能成为—个普遍的原则。他认为在国家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对先进国有利而对落后国有害。

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基础的论述及马克思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作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的发展，被多马认为是最接近于经济增长的理论<sup>[1]</sup>。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研究是遵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他重视收入分配规律（特别是剩余价值决定与使用规律）的探讨，他认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将因利润率下降而自我终止、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征<sup>[5]</sup>。马克思关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论述有如下结论：第一，马克思把资本的数量和资本使用的效率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第二，在扩大再生产时，首先是由于投资的增长，而不是投资效率的提高。第三，技术进步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公共投资效应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在西方国家逐渐受到重视。阿肖尔 1989 年把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生产率的下降归因于基础产业的投资不足。他研究认为，美国公共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高达 146%，在基础产业落后的国家这一比例会更高<sup>[8]</sup>。在投资战略研究方面，经济学家提出了两种理论模式，即平衡增长和非平衡增长战略。纳克斯也是平衡增长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1953 年）—书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摆

脱贫困的途径必须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全面投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的问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就是因为人们的实际收入低下，由于收入低下，必然导致需求不足，需求缺乏弹性，便形成了恶性循环，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全面投资。非平衡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艾伯特·赫希曼，是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非平衡增长理论的创立者，他在《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指出，现有资源和企业家稀缺，平衡发展战略不可行。他认为，平衡发展对欠发达国家无益处，各部门、各产业同时发展，各种资源在欠发达国家都是稀缺的，各种矛盾同时解决的办法是可望而不可即。如果欠发达国家能同时解决这些矛盾，它则不是欠发达国家。他指出，对欠发达国家一定要利用稀缺资源，实施非均衡发展，对重点行业和部门要重点突破，通过重点行业和发展来带动其他行业和发展<sup>[9]</sup>。舒尔茨研究指出，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在经济现代化中是携手并进的，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意味着经济状态是非均衡的，非均衡出现时存在着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收益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是给具有人力资本特性的群体创造的；列昂惕夫关于资本富有的国家为什么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之谜的解是投入到这些出口产品的劳动服务是集约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说，一个资本富有的国家出口的专业人力资本的服务。在知识是生产最强大的动力的今天，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实际上就是增长的发动机<sup>[10]</sup>。

### 1.2.2 国内投资研究现状

投资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相适应的。在我国 1978 年前基本是处在计划经济时期，投资的配置基

本是由计划来实现的，投资理论的研究也基本是空白。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投资理论的研究在我国才逐渐开始，投资理论的研究。正像爱因斯坦讲的那样：“科学理论的发展，不是拆了旧房盖新房。它像登山一样，创立一个新的理论就像登上座高峰，视野扩大了，原来隐蔽着的东西被发现了。我们的出发点——原有的理论——仍然历历在目，只显得小了成了广阔视野中的一小部分”。我国的投资理论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的《基本建设财务与信用》，到80年代的《基本建设经济学》再到90年代的《投资学》，可以说每一步都上了一个台阶<sup>[11]</sup>。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背景下，投资理论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研究成果也不少。比较新和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有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扩大内需是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但国债投资应转型，要由直接投资转为支持税制改革，支持减税，从而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sup>[12]</sup>；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认为扩大内需是一篇大文章，今后扩大内需的政策应在刺激需求的同时，更多的偏重供给的调控，用供给带动内需<sup>[13]</sup>。

经济学家李京文教授对我国1953—199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的研究认为，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5.07%。我国的经济增长源泉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投入物使用效率提高的贡献要远大于投入物数量增加的贡献，而我国正好相反<sup>[4]</sup>；程兴华博士在《中国工业投资结构论》一书中指出，投资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投资结构，而不是投资规模。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主体主要是企业，投资行为是企业行为，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去直接确定和控制投

资总规模，切不可把投资规模作为投资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目标<sup>[5]</sup>。耿明斋，胡晓鹏研究认为，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过度的投资又会诱发经济的剧烈波动，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这就是投资的“双刃性”<sup>[14]</sup>；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罗云毅研究认为，如果从需求的角度考虑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重要的是促进最终消费的增长，而不是投资的增长<sup>[15]</sup>。裴春霞研究认为，投资波动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要比消费同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高得多，投资不足，尤其是非国有投资不足，是影响当前经济回升的根本原因<sup>[16]</sup>。

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认为，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这两大指标相互关联，比如今年我国的发展速度若达不到 7%，就很难增加几百万人就业，下岗职工增多，财政收入也会减缓，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sup>[17]</sup>。中央财经大学侯荣国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力度及协调分析》一书中指出，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不能解决目前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产生好的效果<sup>[18]</sup>；张立群、王彤在《当前我国投资特点与走势》中提出，我国的投资增长已逐步从政策推动型变为政策和市场共同推动型<sup>[19]</sup>。

王洛林著的《200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指出，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的，同时指出200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适当调整，扩大内需的政策应更多兼顾消费<sup>[20]</sup>；解三明在《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周期研究》一书中认为，国有经济投资占我国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我国的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而不是企业行为<sup>[21]</sup>。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论坛上表示，资产存量结构，区域及城乡经济布局的不合理三大因素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效益，同时他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农民买不起，

城市职工就下岗<sup>[22]</sup>；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指出，目前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有限，不宜长期实施。他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减弱，继续推行将会严重增加我国今后 5 到 10 年的财政负担，只是困难在时间上的推移，并没有能真正解决困难，过分强调大幅度增加政府投资反会使经济向计划经济时代退潮<sup>[23]</sup>；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指出，我国实施扩张性宏观景气政策已有 4 年时间，但仍未彻底解决内需不足方面的矛盾，如果不在体制改革方面下功夫，单靠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很可能使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长期化，从而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例如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引发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甚至可能发生“滞涨”，即通货膨胀与停滞并存<sup>[24]</sup>。

北京市社科院江晓薇研究认为，一般均衡增长理论把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研究，不考虑系统内部的差异，侧重研究总量及宏观层面的问题，强调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方法无法解释经济现实中出现的经济增长残差问题，而对于资本作为惟一生产要素以及同质性产生怀疑，于是，非均衡增长理论的代表人提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均衡增长理论强调，经济系统中经济行为者的微观行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资源的重新配置能产生效益，从资源的重新配置中获取效益意味着经济系统中存在着许多新的机会，这些机会导致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应运而生。这一理论把人力资本、经济行为者的作用引入增长理论，从而使增长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增长的发动机从投资变为知识，特别是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已越来越多的取代实物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论创新了古典及新古典增长理论只注重宏观总量平衡及物质资本对增长的影响，把经济增长的宏观平衡放置到微观层面研究。她指出，一般均衡

增长理论强调的增长表现为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而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期需要的增长是高速增长，在发展中国家中，即使宏观总量平衡也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只有资源的重新配置、结构调整这些微观经济行为才是扩大经济规模的前提<sup>[10]</sup>。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及方法

### 1.3.1 研究的角度

宏观经济研究包括宏观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流量分析。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宏观经济的流量分析展开的，在对宏观经济流量的分析中，把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作为重点，同时兼顾宏观经济政策及宏观经济体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不是就总量论总量、就结构论结构，而是把影响总量和结构的微观经济行为作为研究重点，用微观经济的研究方法及成果来解决宏观经济研究中的问题。一般说来引起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而引起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直接原因是消费和投资失衡，消费相对于投资而言相对稳定，由于投资既能增加供给，又能增加需求，所以，投资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投资对需求和供给的影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便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在对投资的研究中本文把影响投资需求的诸因素从微观层次上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对策和建议。

### 1.3.2 研究思路与方法

西方经济学家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从亚当·斯密为代表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到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

代表凯恩斯主义理论，从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到以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都对投资与经济增长提出了纷繁的理论和众多的模型。按照西方经济理论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对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推动的，有的认为主要是劳动推动的，还有的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技术进步推动的。对经济增长根本原因的认识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政策主张，认为资本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主张通过合理配置投资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劳动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主张通过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来促进经济增长；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主张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之所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等概念的理解不同。有人认为资本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而且包括人力资本，有人认为技术进步包括在人力资本之中，有人则把技术进步看做独立变量。笔者认为从宏观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实际上很多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交织在一起的，无法彻底分开，也不宜分的很细。若要从某一侧面来研究某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不可能，也不是没有必要，而是某一因素一定要相对独立，并且要有量化的数据，只有这样计算的结果才有较高的可信度。根据这一基本思路，本文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从需求的角度依照国内大多数学者的划分方法划分为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类因素均能较准确的独立量化，从研究的角度考虑也能较容易得到相关的数据，且研究成果更为适用。依照本文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划分方法，在此并未直接提到微观领域的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并不是说

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不重要，其实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并且越来越重要，只是因为本文研究的角度不同。本文投资和消费的概念是大投资和大消费的概念，投资既包括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也包括促进技术进步的投资，投资对供给和需求的贡献既包括了物质资本对供给和需求的贡献，又包括人力资本对供给和需求的贡献。消费也是广义的消费，既包括教育消费，又包括对高技术产品的消费，相关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包括在投资和消费之中。

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把宏观问题微观化，把经济增长的宏观总量平衡放到微观行为层面来研究，通过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研究，用微观问题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宏观经济现象。

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做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需求研究与供给研究相结合、一般研究与重点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相结合。先是从投资入手，对 1998 年以来的投资情况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国债投资情况。在对投资情况较全面了解的基础上，重点对国债投资的结构、规模和项目选择及投资效果根据投资理论进行评价和分析，在对投资的研究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投资本身，而且对影响投资的所有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包括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主要因素和相关因素。在分析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了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及其影响的程度，着重分析了投资与经济增长、投资结构与投资规模。对投资在经济增长和启动内需中的作用、我国内需启动效果不理想的深层次原因及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政策措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分析研究的过程中，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采用了大量翔实的数据和数学模型，并且在把博弈论的方法用在对投资消费及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在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中，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和数学回归的方

法将近年的统计数字进行回归计算，分别求出了投资、消费、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提出了在启动内需中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在分析投资对 GDP 的贡献的过程中，把投资对 GDP 的贡献分为投资对需求的拉动作用、投资对供给的推动作用两方面，并对这两方面进行了定性定量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投资对 GDP 的贡献重在供给的推动作用，投资对需求的拉动作用要小于投资对供给的推动作用，这种分析方法目前国内尚属空白。

### 1.3.3 研究框架

本文的基本研究框架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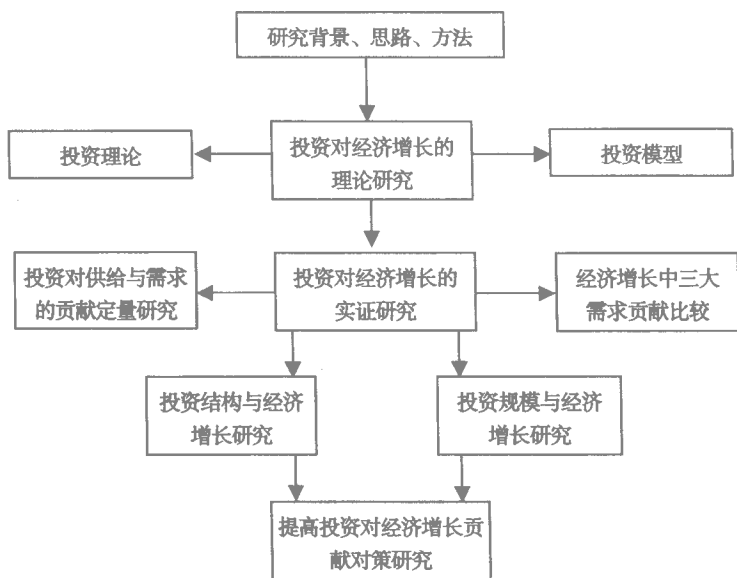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框架图